

苏联文学纪事

(1953—1976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苏联文学研究室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苏联文学纪事

(1953—197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苏联文学研究室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67×1092毫米32开本 14.875印张 801,000字

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3002·198 定价 1.35 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一本有关当代苏联文学的资料，按年代顺序记述了一九五三至一九七六年这二十余年来苏共领导集团关于文学问题的言论、政策和决议，苏联文学界的活动，苏联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以及创作等方面的主要情况，供我国研究苏联文学的同志参考。

本书主要是提供资料和线索，有的地方编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苏联文学中的问题应如何评价，希望读者查阅原始材料加以分析。

目 录

1953年.....	1
1954年.....	16
1955年.....	39
1956年.....	54
1957年.....	73
1958年.....	94
1959年.....	108
1960年.....	123
1961年.....	142
1962年.....	162
1963年.....	178
1964年.....	199
1965年.....	213
1966年.....	229
1967年.....	240
1968年.....	258
1969年.....	273
1970年.....	294

1 9 7 1 年.....	313
1 9 7 2 年.....	335
1 9 7 3 年.....	356
1 9 7 4 年.....	375
1 9 7 5 年.....	392
1 9 7 6 年.....	411
附表一.....	429
附表二.....	443
附表三.....	446
编后记.....	452

1953年

3月5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斯大林逝世。六个月后，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赫鲁晓夫“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在11月底至12月初的各共和国报刊主编会议上，赫鲁晓夫要求“尽量尖锐地发掘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暴露缺陷，激起广大劳动群众开展健康的批评”。

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以后，在创作方面出现了潘诺娃的长篇小说《一年四季》之类有争论性的作品，在理论批评方面，发表了爱伦堡的《谈谈作家的工作》，波麦朗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等文章。

本年10月苏联作协理事会举行第十四次全会，为下一年召开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协总书记A·法捷耶夫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强调要识别“思想敌人”，警惕“国外的敌对力量”引导苏联文学“离开它的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任务”。副总书记K·西蒙诺夫在报告中号召“写真实”，写困难和阴暗面。就在这次会议上，法捷耶夫改任作协主席团主席，另选A·苏尔科夫任作协第一书记。

3月5日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斯大林逝世。

苏联文学界许多人撰文悼唁。其中M·肖洛霍夫说：“我

们多么突然、多么可怕地成了孤儿！”“永别了，我们热爱到最后一息的亲爸爸！”A·柯涅楚克宣誓要成为“斯大林同志的当之无愧的学生”，称斯大林为“我们的父亲和导师”（《真理报》3月8日）。K·西蒙诺夫说：“没有语言能表达难以克制的痛苦和悲哀，没有语言能说出我们是怎样为您而悲伤！”（《真理报》3月7日）。И·爱伦堡说：“我们的损失非言语所能表达。”“人们不仅听从他，尊敬他，而且以巨大的人类的爱来热爱他……因为他能热爱人们……”（《真理报》3月11日）。A·特瓦尔多夫斯基则说：列宁和斯大林“象一个统一的名字，活在我们的心中”（《新世界》第4期）。

3月24日 苏作协理事会主席团举行会议。

作协总书记A·法捷耶夫作了《作家协会工作某些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B·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以及刊出这个作品的《新世界》。报告指出：小说宣扬生活是善和恶两种原则循环交替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而《新世界》除这个小说外，还连续发表过好些有问题的作品。报告强调必须“开展不顾情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它说：苏联文学在完成自己任务时“将遇到国内外我们的敌人和思想上反对者的猛烈抵抗”。它一一列举战后苏联文学中批判过的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形式主义、新拉普等倾向，并指明此前流行的“无冲突论”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学中的反映”。报告还指出：“否定苏联文学的一个普遍方法就是笼统地责备‘缺乏艺术性’”。

《新世界》主编A·特瓦尔多夫斯基承认错误，表示他本人应为此负责。（《文学报》3月28日）

4月8日 苏作协理事会主席团和莫斯科作家积极分子举行会议，讨论苏联讽刺喜剧的道路问题。

批评家 E· 苏尔科夫在报告中说：“许多喜剧的重大缺点之一是，在鲜明地塑造反面典型的时候，却不能突出地表现正面人物的特点”，以致正面形象成为“暗淡的阴影”。“最近出现的讽刺性的剧本几乎全都揭露日常生活中的反面现象”。A· 法捷耶夫在总结中说：在讽刺作品中，“作者对主题和人物的态度特别重要”（《文学报》4 月11日）。

4 月16日 — O· 别尔戈丽茨在《文学报》发表文章《谈抒情诗》，鼓吹所谓的“自我表现”。

文章说：抒情诗人的“特殊责任”首先是对“自己的抒情主人公”、亦即为“自己的个性”负责，为“自己个性的所谓自我表现”负责。“我们很多诗篇缺乏主要的东西，没有人”，亦即“没有抒情主人公，没有对事件和风景的个人的态度”，“真正的情感和激情被它们的代用品所代替”。文章谴责“伪善的批评家”，说他们在诗中只要发现诗人的“沉思”或者“忧郁”，就会说是“悲观主义和颓废情绪”。文章还说：杂志上发表的“大量拙劣的、冷淡无情、毫不动人的诗篇”，“正是写劳动和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的主题的”。它认为，苏联诗人不仅要写幸福的爱情，还要写不幸的爱情。

这里提出的“自我表现”和“抒情主人公”问题，在1954年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成为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6 月4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要让苏联剧院节目丰富起来》。

社论说，在近年来许多剧本里，“我们同时代人的精神面貌和智力水平”给人一种“很原始的印象”，“没有表现出性格的发展和人的成长的复杂过程”。

6 月9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必须克服文艺学中的落

后状况》，要求“大胆地”讨论问题。

社论说：苏联文艺学中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同生活联系很差”，“著作常常脱离现代的根本任务”。文学批评和文艺学的许多著作中教条主义和学究气占统治地位，轻视艺术技巧的庸俗社会学残余尚有所表现。”文章要求对文艺学和批评中的迫切问题“大胆地”进行“广泛的集体的讨论”，要求文艺杂志“大胆地”提出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中的问题。

7月10日以前 苏共召开中央全会。

《真理报》于10日发表这次全会的公报，以及苏共中央的决议和最高苏维埃的决议，宣布清除贝利亚出党，并将其交给苏联最高法院审判。该报为此发表的专论中，提到“个人迷信之害”等字样。另据《苏联共产党历史》（第四次增订版，1972年），当时曾批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后，将近十四年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也几乎没有开过。”全会的精神在文艺界迅速得到贯彻，引起对苏作协领导的同样指责。

13日，苏作协召开莫斯科党员作家会议，讨论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这次全会的总结。苏作协党委书记Г·符拉迪金在会上作报告。他和一些作家批评了作协主席团和书记处的工作。最后，К·西蒙诺夫说：在今天会上，我们谈论作协工作的缺点——作家代表大会几乎二十年没有召开，理事会三年多没有召开，这是“完全合理的”。会上通过决议，“对作家的党组织的工作和苏联作协及其领导机构的活动中存在的缺点作了激烈的批评”（《文学报》7月14日）。

16日《文学报》就此发表了社论《同党和人民在一起》。其中谈到：“党和人民要求于作家的是……深刻研究并表现苏联人民的生活”，是“写真实，而且仅仅是写真实”。“粉饰

现实，害怕表现困难、缺点和矛盾，力求轻易地解决冲突——这是拒绝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表现。”社论还指责作协几乎二十年没有召开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没有改选理事会，而且三年来没有召开理事会全会。

这次作协会议和这篇社论为改组作协作了舆论准备。此后，在文学界的文章和会议上，再三重复对作协领导的指责。

7月20、23日 《真理报》发表B·奥维奇金的特写《在前方》，这是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新世界》1952年第9期）的续篇。此后他又发表特写《在同一区里》（《新世界》1954年第3期）、《亲自动手》（《真理报》1954年8月27、30、31日）和《艰难的春天》（《新世界》1956年第3、5、9期）。这五个特写，写的是同一个区，人物共同，情节连贯。后来合成一部书在《小说报》1957年第1、2期上发表，并以第一篇的标题“区里的日常生活”作为全书的总标题。

在第一篇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里，区委第一书记包尔卓夫被描写成一个顽固、保守、冷酷、自私的“官僚主义者”：他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只想作出成绩，全不关心集体农庄的生产。与他对立的是第二书记马尔登诺夫，他联系群众，关心生产，代表另一型领导作风。在《在前方》里，马尔登诺夫代替包尔卓夫当了第一书记。他接触实际，实事求是，斟酌具体情况来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问题。这两部特写都发表在本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以前。以后的三篇特写，主要是依据九月全会和1954年二——三月全会精神来编写的。例如《在同一区里》公然指出，州里的“官僚主义者”“有党龄”、“有无可非难的历史”、“有多年工作的历史”，

同莫斯科“有权力的大机关”的人“有联系”，并特别点明这种情况发生在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艰难的春天》里，除了写代理第一书记梅德维捷夫刚愎自用、脱离群众，以表明“官僚主义”的严重存在及其顽强的生命力外，还写了马尔登诺夫以及一个比他更精明能干的拖拉机站站长多古尔绅，描写他们敢于同州委书记对抗。

这部作品被一致认为是苏文学中描写农村阴暗面的倡始者，当时不仅在文学界，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据 A·卡里宁说，它“给予农业领导中官僚主义以严重的打击”；“包尔卓夫之流”和“包尔卓夫作风”成为当时“通用的名词”（《文学报》1955年7月7日）。此书以后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据 B·留里科夫说：有人认为奥维奇金是当代苏联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说这个作品是“揭露性文学”（《文学报》1954年3月20日）。

8月1日《文学报》发表社论《党是苏联文学的鼓舞者》。

社论说：批评界及读者“有时力图给共产党员形象以某种刻板的四平八稳，要求小说中描写的共产党员具有全部正面的品质。”“但是党和人民对文学的首要要求，是真实和多方面地反映现实及其矛盾和困难、成就和缺点。……”

同日《文学报》刊登 A·阿纳斯塔西耶夫的《演剧季简评》一文，评论1952年9月到1953年7月演出的戏。

文章认为，这段期间“在我国的戏剧创作和剧院艺术的发展上……成为转折时期”，“已经感觉到同无冲突论斗争的初步效果”，“有希望的萌芽已经出现”。文章说：这个演剧季内剧院节目的主要特点是“为喜剧在舞台上复兴而斗争”。它说，Л·佐林的《坦率的谈话》是在几年前写的，其

中把钻营家、坏蛋充当剧中的主要角色，由于当时认为主要人物应该是正面的，因而不能演出。只有到这时候才能出现在莫斯科的舞台上。H·包戈廷的《当争吵的时候》和C·米哈尔科夫的《虾》的演出，也是剧院勇敢争取的结果。

8月27日 《文学报》发表社论《必须反映生活的真实》。

社论要求“勇敢地反映典型的现象，无畏地揭示生活的矛盾，提出极重要的问题。”并说：“任何的粉饰现实，首先是对人民的理智和力量的不信任。”

9月3—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

会议选举赫鲁晓夫担任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

这次九月全会的精神就是赫鲁晓夫后来说的，“发掘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暴露缺陷”。《文学报》一篇社论说：“大胆、深入地了解现象的底蕴，无畏地描写生活，连同困难和矛盾——这就是苏共中央九月全会决议对作家的号召”

(12月12日)。正象有人指出的那样，在这次全会后，“大多数文学家……开始严肃地描写农业中和农村中的缺点”(Ф·马洛夫语，见《文学报》1955年10月20日)。

9月10日 《文学报》发表社论《要全面地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

社论指责写工农题材的“生产的剧本”、“集体农庄的剧本”“彼此一模一样”，“所叙述的不是性格的历史，而是技术发明、生产革新的历史。”社论还对写集体农庄题材的绘画横加嘲笑。

这种把描写工农业题材的作品讽刺为“生产的”、“集体农庄的”而加以嘲笑和责难的言论，在《真理报》11月3日的社论和在10月下旬举行的作协理事会全会上B·拉夫列尼

约夫的报告一再出现。后来批评家 C·什图特对这些非难作过一些批评（见《文学报》1954年12月7日）。

10月1日 《文学报》发表社论《孜孜不倦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责“个人迷信”，说“近年以来，在宣传工作中以及在个别艺术作品中，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过非历史主义的阐述，这表现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唯心主义的个人迷信理论的流行上。”

本月6日和23日该报发表的 C·兹洛宾和 Г·列诺布尔的两篇文章也有类似的提法。本月下旬举行的作协第十四届理事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也有人涉及这个问题。

可以与此印证的是1956年6月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它说：“三年多来党坚持不懈地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坚决克服个人迷信的后果……”（《真理报》7月2日）

10月22—24日 苏作协理事会召开第十四次全会。

会议以讨论“当代戏剧的状况和任务”的名义召开，由 K·西蒙诺夫（作协副总书记）和 B·拉夫列尼约夫作报告和补充报告。会上决定在下一年召开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并决定“恢复”作协章程中原设的理事会主席职位，让 A·法捷耶夫任主席，而撤销他的作协总书记职务，改选 A·苏尔科夫任第一书记。这次会议为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西蒙诺夫在报告《苏联戏剧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中要求“真实地描写生活”，不同意在生活的发展中描写它，即要求把生活描写成“现在有的样子”，而反对把它描写成“应该有的样子”，“人为地隐瞒困难和阴暗面”。他也反对“用理想人物的概念代替正面人物的概念”，而主张“正面人物”

应该是“活的、人世间的人”。他肯定《真理报》当时发表的一些文章提出戏剧创作和演出中的问题，并说，由于《文学报》对这些问题进行广泛讨论，因而在剧评里，“死板的教训”和“刻板的公式”已“逐渐减少”，而“提出尖锐问题的文章”则比较多了。报告还反对“把对反面生活的各种描写，宣布为歪曲现实。”最后，报告赞许A·苏罗夫的《正派的人》和Л·佐林的《客人》等剧作，并且说：“我们的戏剧创作此刻正在集中力量摆脱它数年来的落后状态”。拉夫列尼约夫在补充报告《新的剧本和戏剧季的展望》中指责戏剧题材“狭隘而且贫乏”，只限于“‘集体农庄的’剧本和‘生产的’剧本”这“两类名目”。报告还说：新的剧本的共同点是“亲切地注意人，注意人的内心世界”……

在讨论中，莫斯科州立教育学院教研室主任M·扎列斯基对西蒙诺夫等两个报告没有揭露“表现在我们许多剧作中的唯心主义个人迷信之类的问题”而表示不满。С·米哈尔科夫指责一些剧作家迫使自己人物“甚至在最复杂的情势下”行动时，“也没有动摇、没有思考，没有实际生活的复杂性”。批评家E·苏尔科夫赞赏西蒙诺夫的报告，说它“贯穿着对教条的抗议，给广泛而自由地解决我们文学的基本任务展示了可能性。”文化部长П·波诺马连科则要求作家、剧作家为九月全会的各项决议的任务服务。

法捷耶夫在发言中指出：“要在苏联文学发展的道路上识别思想敌人和一切国外的敌对力量，这些力量还可能在苏联社会的叛徒中得到或多或少隐蔽的支持，利用苏联人意识里的资本主义残余，企图引导我们的文学离开它的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任务”（《文学报》10月22、24、27、29日）。

10月 《旗》第10期发表И·爱伦堡的《谈谈作家的工

作》一文。

文章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歪曲文学的功能，说它主要是帮助人们认识“人的内心世界”。2.指责过去把倾向性理解为“天真的、无力的偏袒”。说“描绘世界不能光用黑白两种颜色”，写法西斯分子，也可以使他们“不乏某种美德”。3.要求写活人，写“活生生的”“人物”。说要把他们的“内心的冲突和矛盾表现出来”，“应该揭示隐藏在人的心灵深处的光明和黑暗的斗争”，“应该把书刊上都还没提到过的精神上的毛病表现出来。”4.主张写日常生活琐事。

在文章结尾时说：他“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以后才断定，“提出有关作家工作问题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10月27、31日，11月3日 《文学报》连载B·叶尔米洛夫的《论俄罗斯文学中的人民性》一文。文章反对文学中的“个人迷信”；提出“共产党的党性就是最高的人民性”的口号。

文章强调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并且认为，B·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一诗“充满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文章宣称：苏联现代文艺发展中的“弱点和缺点”“有时就表现为放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人民性的原则”。在个别作品里，特别是传记片里，“人民不是作为作品里的真正英雄而出现，而只是作为插画，作为一种用来加强某个杰出人物的形象的、装饰用的……背景”，这也就是“党性原则离开人民性原则”。文章断言：“共产党的党性是最高人民性”。文章最后还要求“加强对……人的命运的注意”。

11月3日 《真理报》发表专论《进一步提高苏联戏剧

创作的水平》，要求文艺“干预生活”。

专论说：“积极地干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战斗口号，这种艺术同那种对当代生活最尖锐问题持胆怯的态度是格格不入的。”“人学——这是高尔基给文学下的定义。观众想在剧中看到我们同时代人的性格，包括他的思想、激情和行动的全部深度。”“简单化地、庸俗地区分剧本为‘生产的’、‘集体农庄的’等等，反映了肤浅的和极其局限的生活知识，对艺术创作任务的蒙昧无知。”

11月 《共产党人》第17期刊登H·格里巴乔夫的文章《论苏联文学的某些特点》。文章批评了文艺界的一些严重倾向。

文章所批评的主要有：1. “有人机械地搬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和手法到苏联文学中来，……单用黑色来描写现实，在同反面现象作斗争的旗号下，忘掉主要的东西。”2.

“世界主义鼓吹者”要求向资产阶级文学的典型和性格看齐。他们认为，我们同资产阶级“在全人类性和艺术规律上是共同的”；他们“模仿资产阶级艺术”并“在资产阶级的艺术实践中寻找我们艺术的尺度”。文章说：“世界主义鼓吹者”还美化资本主义国家文学，说他们中“部分作家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另一部分也“最接近批判现实主义”。3. 有些批评家不仅要使反面人物突出，还要使正面人物“着陆”；有些批评家评价文学时，不是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而几乎是以十八世纪卡拉姆静时代就存在过的一般文学尺度和法则为指导。

11月19日—12月2日 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各州、边区和各共和国的报刊的主编和农业经济栏负责人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批评各报刊“往往把事情说成这样：中央委员会

提出的全部任务都已经解决了。这样的好心肠只能给事业带来害处。”他说：“报纸应该尽量尖锐地发掘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暴露缺陷，激起广大劳动群众开展健康的批评。”他指责一些报纸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文学报》也在被点名批评之列（《文学报》12月5日报道）。这引起苏作协的严重注意。

12月9日，苏作协书记处和《文学报》编委会联合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近年来写农村的作品。各共和国、边区和各省的许多作家参加会议。A·苏尔科夫致开幕词时说：“不久前举行的作协理事会全会的工作没有贯穿着我们国家全神贯注的那些问题。文学所面临的任务是：敏锐地、干练地响应农村中所发生的那些宏伟的事件”（《文学报》12月10日、12日）。

接着，12月12日《文学报》发表社论《跟人民在一起》，批评作协书记处的工作在九月全会以后也没有“重大的改进”；并说：关于今天农村的书又少又不深刻，这“因为作家对生活了解不够；有时在引人注目的缺点后面没有觉察到成绩……有时正好相反，把预备做的事当作已经实现的，闭眼不看缺点和矛盾。”社论说：“大胆、深入地了解现象的底蕴，无畏地描写生活，连同困难和矛盾——这就是苏共中央九月全会决议对作家的号召。”

12月2、4日《真理报》连载了A·卡里宁的特写《中等水平》。

某区第一书记聂维洛夫“只会算帐，不能把头抬得比数字和事实更高”，区里的情况对于他来说有算盘就行，他从来没有到下面去搞调查研究。区里农业科新来的指导员叶辽明却和他相反，同他的工作方法进行斗争。特写通过聂维洛